

明代经筵教育的热情与失意

辛泽西

摘要：中西方都有不少历史人物的教育传统活动，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也在留下了兴衰个案。西方通过个人成功发挥社会影响，中国传统上层教育和精英团队共同集体发展。明代经筵儒学教育是一个典型个案，颇具研究价值。

关键词：明代经筵 儒学教育 上层阶层 社会知识

经筵是中国历史上皇帝为起用儒臣讲经论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制度。经筵传承儒学，稳定礼仪规范。在西方历史上也有“教导国王与君主”的理想系统，但主要通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与中国博学文人集体连续辅导皇帝的付出不同。学界多讨论经筵教育，而对博学文人集体性的角色和特点较少研究。本文尝试在这一方面做一点介绍。

一、明代经筵教育的主流

明代经筵的前史，一般认为形成于北宋。但我认为可以追溯更早。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提出：“汉代由此定出察举科目，有孝廉、茂才（秀才）、察廉（廉吏）等12种。科目名称花哨含糊，但察举程序中附有一篇对策，通过考试辨别受察举者的优点。”^①汪德迈对汉代儒学文人群体的特点讲得很清楚，并认为现汉代博士制是上层正统儒学制度的最早基础，当然，北宋的经筵制度已经比较成

^①〔法〕汪德迈：《中国教给我们什么》，〔法〕金丝燕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0年，第68—69页。

熟。明代基本沿袭宋朝。

（一）经筵的目的

明朝经筵的决定设置是由皇帝决定的，但明政权初建时，儒臣起了主动作用。儒臣从历史传统中认为“自昔圣主贤臣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具载六经，垂训万世，不可以不讲也。讲之则理明而心正，措诸政事而无不当”，建议太祖朱元璋“宜择老成名儒，于朔望视朝之际，进讲经书一篇，敷陈大义，使上下耸听，人人警省，兴起善心”。宣德十年英宗继位不久，内阁大学士杨士奇以践行先皇（宣宗）遗训的名义，上呈了一篇《开经筵疏》，内称：“去年十月内，宣宗皇帝御左顺门，召臣士奇谕之曰：明年春暖，东宫出文华阁读书，凡内外侍从，俱用慎择贤良廉谨之臣。臣士奇叩头对曰：此国家第一事，正维其时！伏望皇上留心。不幸宣宗皇帝上宾，中外皆同哀戚之心，臣未敢遽言。”^①英宗继位，儒臣附中。

（二）经筵的时间与学期

开讲筵的日期，由皇帝掌握主动权。皇帝规定经筵日讲的时间和期限。经筵幸逢盛会，开办经筵具有仪式性和示范性，就在经筵之外设立日讲制度，加开“日讲”，选定儒学教材，逐章指解，这是皇帝和博学文人共同参与的教育活动。

大抵国家典制，经筵于殿中，日讲于殿后；经筵讲官凡十有六，词臣皆得与，日讲官惟六，不轻与；经筵日轮员，而日讲日轮二员；经筵惟月之二日，又祁寒暑雨皆罢，日讲不问寒暑；经筵讲官执讲义以进，日讲则讲官执牙签近御前口授；经筵用侍班、侍仪诸臣，日讲独阁臣与讲臣耳；经筵上称官人，日讲称先生；经筵其礼繁，其数旷，日讲其体亲，其功专；旒纛尊严，不废课诵，几务劳勩，不厌诗书，称为先生而不名，起立拱手而不为屈，

^① [明]杨士奇：《开经筵疏》，载黄训辑《名臣经济录》卷一二“内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直陈时事而不讳，敷奏兴衰而不为忌。^①

日讲是每天举行的课业，在殿中，而经筵在文华殿或后殿举行。文人儒臣对于皇帝的儒学教育自命为帝师，称是皇帝的“师友之臣”，实际只有半个“帝王师”身份。每次进讲，只能立讲，稍失仪态，就有可能遭到纠劾甚至免职，所谓“日讲视经筵不同，天颜咫尺，自无取发扬蹈厉”^②。

在日讲和仪式讲座之外，经过经筵制度化后，在年度学期的安排上，孝宗设立春讲、秋讲制度。“愿皇上以古圣哲之心为心，视朝之暇，御经筵之日多，居宫苑之时少，所谓无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数近儒臣讲求至理，笃尽精一之功，推极修齐治平之道，使学问功至，理欲判然。”^③在孝宗朝之前，只规定“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会讲”，没有春讲、秋讲之说，经筵日讲都是不论寒暑，全年如期举行。直到弘治五年，讲官王恕体察上意，首先提出“闻祖宗时，常御经筵，遇盛寒暑则暂止”，建议“按天顺、成化间故事，于盛寒暑暂止经筵，保育圣躬”^④，春讲、秋讲之说才被提出来。当时监察御史汤鼐便上疏孝宗，“乞以六月初一日为始，仍旧御经筵及午朝”。无奈王恕所提的建议可谓正中孝宗下怀，所以孝宗不顾群臣反对，坚持“诏待稍凉即行”^⑤。在这种情况下，儒臣只好做出让步，使“春讲”“秋讲”渐成定制。从此经筵日讲的时间被减半，只在每年的二、三、四月和八、九、十月春秋两季举行。

（三）儒学的热情

明万历时，在首辅张居正的严厉督导下，万历成为明朝皇帝中

① [明]张鼎：《宝日堂初集》卷十五，转引自谢贵安、谢盛《明代宫廷教育史》上，北京：故宫出版社，2015年，第166页。

② [明]黄景昉撰，朱曦林点校：《宦梦录 馆阁旧事》，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45页。

③ [明]刘球：《十事疏》，载张瀚辑《皇明疏议辑略》卷一“君道一”，明嘉靖刻本。

④ 《明孝宗实录》卷十四“弘治元年五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5年。

⑤ 《明孝宗实录》卷十五“弘治元年六月”。

最勤奋的帝王。张居正为他制定进学的仪注，即沿用前朝的仪制，每年分春讲、秋讲两季，在这两季中，除每月三、六、九日（共九天）为视朝日，其余的时间都要“御文华殿讲读，非大寒大暑不辍”。万历在这十年当中，基本上都能按时出席经筵日讲，入学未曾懈怠。甚至能够在讲读结束之后，“将经书从容温习”，隔天向讲官主动请教。据统计，万历皇帝在这近十年当中，共出席经筵99次，日讲601次，共计700次。而这只是很不完整的记载，实际次数要远超过上述数字。因为《明神宗实录》相当一部分史实是根据《万历起居录》编纂而成的，而《起居录》不少篇幅早已散失，这直接造成了实录记载的缺失。不过就查阅现存的记载看，已经足以反映出万历皇帝进学的热情。万历三年四月，他共出席经筵日讲活动16次，其中每月三次的经筵无一缺席。他的这种进学精神，很受当时儒臣的称赞，谓“吾皇继位以来，以三、六、九日为临御之期，余为日讲之期，辅臣侧侍，儒臣进言，讲论经史，寒暑不废，勤于学”^①。

二、皇帝与儒臣的教育差异

经筵制度化以后，皇帝个人兴趣与经筵儒臣会发生矛盾，特别是以大学士为首的儒臣文人集团，在捍卫儒礼上，有时态度激昂，反而遇到抵制。君主双方“你进我退”，其背后是双方认知系统上的种种差异。

（一）少数皇帝对儒学学习缺乏耐心

明太祖、太宗及以下几代皇帝中，有人往往没有采纳经筵，皇帝推托的原因是儒臣每次上书都咄咄逼人。御史陈祚的说法最为直白，称：“帝王之学先明理，明理在读书，陛下虽有盛德，而经筵未甚兴

^① [明]吴达可：《圣治宜新乞勤政学以隆治安疏》，载吴亮辑《万历疏钞》卷一，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本。

举，讲学未有程度，圣贤精微，古今治乱，岂能周知洞悉？”^①难免使皇上反感。嘉靖在位的四十五年中，只有前期的四到五年时间对经筵较为热心，“经筵日讲未尝暂辍”，其他时间都很消极、厌倦，总是借各种理由拒绝经筵；即便出席日讲，也不过是应付、敷衍，正如给事中张侨所言：“奉天门奏事，徒为观听之具；文华殿讲读，略无问难之言。”^②嘉靖十六年（1537）文华殿失火，给了嘉靖彻底停辍经筵日讲的借口。在这之后，他虽然还是照常任命经筵日讲官，但自己既不上朝，也不再出席经筵，甚至在数年之内，大小臣工“未得一睹天颜”，经筵日讲制度更是形同摆设。“估计这时世宗皇帝已经从儒家修齐治平理论中，转向道家无为长生的追求上了。”^③

皇帝对文人帝师的偏爱也造成皇帝的选择。在张居正死后，明万历对经筵日讲活动逐厌倦，很快就发展到排斥的程度。万历十七年（1589）之后，虽然照常任命日讲讲官，但万历不再出席经筵。大学士在劝说皇帝无效的情况下，只好想出一个妥协的办法，即皇帝可以不亲身出席，但讲官定期给皇帝进呈讲章。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经筵一直靠这种“进呈讲章”的方式在名义上得以维持，这样的经筵可以说有名无实，完全失去了教育的机会。

（二）儒臣对经筵效果不佳的反应

大多数儒臣对经筵效果不好是有反应的。时常有耿直的大臣上疏批评皇帝，批评的内容总是一些固定不变的陈词滥调，但也不是所有的儒臣都一味地斥责皇帝，也有人对经筵教育的问题做过反思。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隆庆朝内阁首辅高拱。高拱曾长期担任明穆宗的日讲官，出任内阁首辅之前，对经筵教育有深切体会。他认为皇帝拒绝经筵教育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懒惰、不爱学习，大多数皇帝是爱学习的。以

①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六二《陈祚传》，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925—2926页。

② 《明世宗实录》卷二十四“嘉靖二年三月”。

③ 谢贵安、谢盛：《明代宫廷教育史》上，第284页。

明穆宗为例，在当皇子时“聪明特达，孜孜向学，虽寒暑罔辍”^①，对《尚书》有深厚兴趣，曾亲自在经筵上讲解过该书的“洪范九畴”。高拱认为，经筵教育首先应当切合实际，让皇帝在处理朝政时能够有所运用，有所借鉴。具体地说，就是懂得“如何慎起居，如何戒嗜欲，如何务勤俭，如何察谗佞，如何总揽大权，如何开通言路，如何赏功罚罪，如何肃宫闱，如何御近习，如何治百官，如何安抚百姓，如何镇服四夷八荒”^②。但大部分讲官总是不能教给皇帝这些本领。翰林院修撰何瑭还惹怒了明武宗，被撤掉经筵讲官之职，幸得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等申救才免去裁撤。^③高拱深刻体会到，当时这些翰林出身的讲官，于四书五经之外知之甚少，既不熟悉本朝历史，又无任何行政经验，很难胜任讲官一职。需要教育改良。

在欧洲，由于政治的中坚力量一直是贵族，读书人一直没有进入统治阶层，因此不可能出现类似的现象。虽然欧洲的文人也有“教导君王”的想法，例如以色列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在研究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时指出：“哲学家的任务清晰而复杂：他们的责任是宣扬一种高尚的道德，运用自己全部的知识寻找真理、改变民众的行为方式，同时还不能忘记教导国王与君主。”^④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就提到了伏尔泰获得国王召见的事，建立这种文人以群体身份要求充当“帝王师”的现象在他们那里从未出现过。

三、经筵制度与政治因素

经筵为何在明朝而非更早形成制度化？从史料看，主要分析两点如下。

① [明]高拱：《日进直讲序》，《高拱全集》下，北京：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37页。

② [明]高拱：《本语》卷五，《高拱全集》下，第1275—1276页。

③ 《明武宗实录》卷九“正德八年四月庚申”。

④ [以色列]施罗默·桑德：《从左拉到维勒贝克》，樊艳梅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第75页。

（一）儒臣群体的入世意识增强

虽然汉武帝时期就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儒家在政治中建立统治地位是从宋朝开始。两宋时期陆续出现了二程（程颢、程颐）、周敦颐、张载、朱熹等德高望重的理学家，这使得儒臣拥有了充当“帝王师”的底气。另外，随着科举制度在隋朝的建立，特别是世家大族在晚唐五代时期的军阀混战中日渐没落，科举出身的儒臣逐渐取代中古时期的门阀士族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中坚力量。而到了明朝，读书人的数量更是大幅增加，从15世纪到17世纪，中国全国人口约增加一倍，而生员人数约从三万增加到六十万。^①这使儒臣的群体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对于儒学入世的政治追求也随之提高，这种倾向在经筵活动中也体现出来。

（二）“废相”改革对儒臣文人集体的打击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朱元璋对政治体制做了一项违背儒臣心愿的改革，即废除了宰相。关于废宰相一事，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看法。史学家钱穆和思想史家徐复观还就此争论过。钱穆认为宰相的废除使皇帝权力的集中程度大大提高，“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督促；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②。钱穆还认为张居正身后是因为他生前违反了明朝“不设宰相”的国法，自己本不是宰相却以“相体自居”^③。徐复观则认为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和前代的宰相并无二致，“凡与皇帝最易接近的，不论其官阶之高下，常即居宰相之实。换言之，宰相的实质，常决定于与皇帝的关系，而非决定于官制，此系专制政治的本质使然。言中国政治制度者不了解这一点，便不能真正得

① 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②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09—110页。

③ 徐复观：《论知识分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25页。

到要领”，“大学士成为实质宰相，已得到朝廷正式的承认”。^①但从明朝当时的人对“废相”一事反应上来看，钱穆的观点更有道理。明末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讲到，“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罢丞相导致“以君为主，天下为客”，“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②。

儒臣阶层可以辅佐皇帝，与皇帝共同承担治理天下的重任。宰相制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政治符号，它的所指是“君与臣共治天下的政治形态”。只要该制度存在，儒臣的政治地位就是稳固的。而该制度的废除则意味着天下只属于皇帝一个人了，儒臣深深感觉到自己被边缘化了。因此，明代儒臣群体所做的各种制约君权的努力，大多都是为了弥补“废相”带来的损失，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努力将自己的“帝王师”身份发挥到极致。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儒臣在已经发现经筵教育效果并不好的情况下，仍不提出废除，宁愿用进呈讲章的方式，替代皇帝亲自出席也要让该制度维持，儒臣的“帝王师”身份就得以保住，“君臣共治”的局面就得以稳住。

经筵制度化前与制度化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明王世贞记载道：“时庄皇帝每朝及经筵，默不发一语。”^③但总的来说，经筵制度化在明代保持了下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起到了维护儒臣政治地位的作用。到了明末内忧外患的崇祯朝，经筵还给皇帝提供了一个与朝臣商讨国事、交流意见的平台。

① 徐复观：《论智识分子》，第227、231页。

② [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篇》，《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10，第2—3页。

③ [明]王世贞：《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阜南陆公树德神道碑》，载焦竑辑《国朝献征录》卷六三“都察院十”，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徐象樸曼山馆刻本。